

◀ （上接 10 版）

兴路中兴路口)为临时校舍,此时学生数已达800多人。8月上旬,确定青云路师寿坊（今青云路167弄上海海运局宿舍位置）15幢民房为校舍,弄堂口还挂上了于右任写的“上海大学临时校舍”的牌子。此时,上海大学的声誉蒸蒸日上,考虑到未来发展,校方决定筹钱建造校舍。1927年春,江湾新校舍落成（今圣堂路奎照路),4月1日,新学期开学。然而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发生后,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给上海大学扣上“赤色大本营”的帽子,强行查封学校,新校址也挂上“国立劳动大学”的牌子。

从1922年到1927年的5年时间里,上海大学六迁校址:从青云里到西摩路、老西门、德润坊、师寿坊、江湾,是一所名副其实的“弄堂大学”、“陋校”。尽管期间国民党当局也数次拨款资助学校建设,但在共产党人参与管理与教学,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影响日益增大的情况下,国民党当局遂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际,将学校封闭。

2013年4月3日,“青云路上的红色学府”上海大学(1922—1927年)遗址纪念墙在上海市第六十中学建成。学生们根据上大青云路校舍外观的老照片,用利乐包和旧衣服为主要材料进行复原制作。2014年10月23日,“溯园”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落成,占地1800平方米,全年向校内外开放。而老上大因颠簸流转散落在街角巷落的其他印记,也受到了世人的关注和重视。

老上大和现在的上海大学并没有血缘上的关系,之所以要追溯那段烽火岁月,刘长林认为是为了继承一种大学精神,一腔热血青春:“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,致力于服务国家和社会,这在新老上大是一致的。老上大将社会学系培养成革命人才的大本营,而在1980年4月,上海大学社会学系(时称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)重建,这也是1979年社会学学科恢复后中国大陆高校成立的第一个社会学系,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科特色和优势。”他希望现在的上大学子,能像老上大前辈那样,不枉费大好的青春年华,严于律己,在求学和今后的发展道路上走出新高度。

同一个校名,将穿越时空的两所大学连接在一起。石库门里“弄堂大学”的简陋当然不比现代化优越的办学条件,但那里集聚起来的良师、培养出来的英才,却狠狠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的方向。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,老上大的革命精神一定将继续激励来者,勇往直前。

上海建党岁月里的红色学堂

建党前后,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,在上海领导创办主持了一批“红色学堂”,覆盖青年、工人、妇女。之所以称之为“学堂”,是因为它们的学制并不完善,有些只是补习班、补习社,却在引导工青妇走向进步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【外国语学社】 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

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,让进步青年看到了中国的希望。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,介绍苏俄、学习苏俄成为主流,研究俄文、到俄国去,也成了很多人心中的向往。1920年4月,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中国,与李李大钊会晤,随后又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,双方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探讨。1920年8月,陈独秀领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,紧接着又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,地址就在法租界霞飞路（今淮海中路)的渔阳里6号。

时机成熟,同时为了掩护党团工作,党领导下的“留俄预备班”——外国语学社成立了,地址同在渔阳里6号。1920年9月28日,《民国日报》刊登《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》:“本学社拟分设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语各班,现已成立英、俄、日语三班……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本社报名。”学社由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担任负责人,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为秘书,协助工作。俄语教员起初由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和杨明斋担任,后又延请王元龄执教;英语教员是袁振英、法语教员是李汉俊、日语教员为李达、世界语教员为俄国新闻记者斯托比尔。

外国语学社虽刊登广告向社会招生,但学生基本是经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或青年团的有关人士介绍进来的。学生数最多时有五六十人,刘少奇、任弼时、罗亦农、萧劲光、李启汉、许之桢、傅大庆、周兆秋、彭述之、蒋光慈等,都先后在学社学习过。王元龄曾回忆过她当时给学生上课的情景:“教室在楼下客堂,黑板挂在中间,黑板面朝东。学生约有50人,课桌放得很挤,中间有两条走道。”学社非常重视政治学习,组织学生学《共产党宣言》和《共产党》月刊等,萧劲光就曾说到他读的第一本马列的

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,“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”。

除了学习,学生还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,参加革命实践,学社的很多成员后来也加入了团组织。从1921年春天开始,由杨明斋和包惠僧负责,选派学生分批赴俄。最终有30多人长途跋涉来到俄国,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岁月。1921年7月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,外国语学社逐渐停止活动。

【上海工人半日学校】 第一所工人学校

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,先天就和工人阶级有着血脉之亲。1920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时,就已经将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点。小组成员李启汉被派往工厂密布的沪西小沙渡筹建纺织工会,但他认为纺织工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,可以先从创办工人半日学校入手。

同年秋天,沪西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在槟榔路锦绣里(今安远路)日商内外棉九厂的一幢两层楼房里成立。李启汉主持办学并任教,他根据工人上工时间,开早晚两个班,故称为“半日学校”,教科书用的是基督教青年会编的普通识字课本。然而,一开始并没有多少工人报名,即使来上学的人也经常缺课。为了扩大学校影响,李启汉决定在寒假期间,将学校改为工人游艺会,用文娱活动来吸引更多工人。

1920年12月19日,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召开,李启汉、杨明斋、邵力子、沈玄庐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都发表了演讲,他们鼓励工人破除陈旧观念,团结互助,努力学习。游艺会非常受工人欢迎,李启汉也借机帮助他们组织了纺织工会沪西支部。第二年春天,学校重新开放,报名工人明显增多。教员在课堂上除了教认字,还对工人进行革命的启迪,向他们讲解资本家剥削的真面目,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斗争。学生孙良惠成了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,后被推举为纺织工会的负责人,在1925年的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不久,学校就被租界当局盯上,后被巡捕房封闭。1921年夏天,工人半日学校改名为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,中国劳动组合

书记部干事李震瀛任校长,报名人数增至200人,成为早期开展工运的阵地之一。1922年李启汉被捕后,学校一度停办。同年秋天,青年团员嵇直被派到沪西小沙渡地区开展工作,他从开办小型工人补习班做起,还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,赢得了工人的信任,使得补习班又重新开了起来。此外,在劳勃生路,一个相似的工人补习班也开了起来,由徐玮主持。

1924年5月,邓中夏将两个补习班合并为更大规模的工人补习学校,设在小沙渡路(今西康路)和槟榔路(安远路)交界的一套3间平房里。而当时在社会上已经颇有名气的上海大学师生,也给予工人补习学校以有力的支持,从中发展党团成员。孙良惠不仅成为上海纺织工人中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,后来还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。

【平民女校】 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

1921年,在新文化、新思想的影响下,妇女解放运动兴起,一大批进步女学生来到上海寻求真理,而女工参加工人运动的热情也日渐高涨。在这种情况下,陈独秀和李达商议,决定“在上海创办一个平民女校,以期养成妇运人材,开展妇运工作”。为了便于掩护,平民女校以黄兴夫人黄宗汉所主持的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举办,于1921年12月筹办,翌年2月开学,校址在南成都路辅德

里632号A（今成都北路7弄42号）。李达出资租房并任教务主任,其夫人王会悟(平民女校高级班学生)负责具体工作。学校设有高级班和初级班,半工半读,招生年龄不限。当时学生有30人左右,丁玲就是高级班的学生。初级班学生钱希均曾回忆说:“平民女校是半公开的,学生有年龄大的,也有年龄小的,有中学生,也有小学生。来的教师都是大学教授,也有外国人。在附近住的人认为平民女校不简单,不是一般的学校。”

当时的教员都是义务兼课,有不少是共产党员。高级班的课程有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等,教员包括邵力子、高语罕、陈望道、沈雁冰、美国人安利斯、李达、周昌寿、李希贤、陈独秀等。初级班主要教语文、英语、算术,教员有王会悟、高君曼(陈独秀夫人)、张秋人、柯怪君(柯庆施)。除了陈独秀、李达外,施存统、张太雷、刘少奇等,后来都曾到女校作过演讲。

当然,女学生们也不负众望,积极参加党团组织的各种活动。1922年,日华纱厂工人罢工,女校学生就到工人中去演讲宣传,还走上街头募捐,支持工人运动。此外,在纪念马克思诞辰、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等活动中,也都能看到女校学生们活跃的身影。王会悟、王剑虹还负责编辑《妇女声》半月刊。

1922年秋天,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前往湖南任教,教员也大多忙于革命工作,再加上经济拮据,平民女校最终停办,部分学生后来进入上海大学继续学习。

（资料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）



平民女校旧址